

中国古代文体丛书

散文

谢楚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体丛书

散文

谢楚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谢楚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7

(中国古代文体丛书)

ISBN 7-02-001826-2

I. 散… II. 谢…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②文学研究-散文-中国-古代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055 号

责任编辑:管士光

封面设计:了之

封面题字:林东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21,000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30

定价 3.9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与文体分类	1
第一节 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	1
第二节 古代散文的文体分类	7
第二章 古代记叙文	15
第一节 古代记叙文发展概况	16
第二节 古代记叙文的笔法	22
第三节 叙事	31
第四节 传记	38
第五节 游记	47
第六节 杂记	63
第七节 笔记	73
第三章 古代论辩文	87
第一节 古代论辩文发展概况	87
第二节 古代论辩文的艺术特征	95
第三节 论	102
第四节 辩与议	107
第五节 说与解	115
第六节 原	120
第四章 古代讽谕文	124
第一节 古代讽谕文的艺术特征	126
第二节 寓言	135
第三节 杂文	147
第五章 古代实用文	163
第一节 书信	164

第二节	赠序		173
第三节	碑志		179
第四节	哀祭		189
第五节	公牒		195

第一章

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 与文体分类

第一节 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

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我国古代散文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一决定于它的性质: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性;二决定于它的生存环境:基本上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相始终。从这些特色中,既可以闻到民族土壤的芳香,也可以闻到这种土壤中腐殖质发出的酸腐味。细论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功能上的实用性

我国古代散文很有点像工艺美术,大部分作品离不开实用。不是为了实用,它不会产生;不是为了实用,它不会发展;一旦失去实用价值,它也就要消亡。愈是前期,它的实用性就越大。不管是从甲骨文算起,还是从史官的记录算起,都是为着实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分别是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就是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散文巨著《史记》,终究还因其又是“史家之绝唱”的历史巨

作而分走了一半以上的成就。魏晋以来,文学散文虽已问世,但绝大部分仍是为了实用。《出师表》、《陈情表》感人肺腑,却都出于奏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号称是大部头的散文作品,却又分别是地理和名胜专著。就是在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中,纯文学作品也是不多的。他们的大部分文章也都是出于办公事、交际应酬,或谋取生活之资而写的。所以古代的散文一般不怎么写虚幻的东西,因为作者们不喜欢把齐家治国、拯救人心的愿望寄托在空想中。他们认为只有被感觉的、能把握的实体,才是最可靠的,只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才最有说服力,因而视怪、力、乱、神之事为邪魔之道,耻于谈论。

古代散文的这一特色,既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一般说,实用性强的作品,其内容是较为充实的,如能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就可能产生字挟风雷、声振金石的作品。同时实用性也促进了题材的广泛性,增强了散文反映生活和干预生活的效用。所以我们往往可以从一个时代的散文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从一个作家的文集可以窥见社会的一个侧面。

实用性与艺术性当然不是不相容的,但要做到两全其美,也决非易事,顾此失彼是难免的。一般说实用性的作品总是质胜于文,事理胜于文采的,其艺术性或多或少要受到损害。这是一条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古代散文之所以不能像古代的诗歌、小说、戏剧那样容易拨动读者的心弦,与它的实用性是很有关系的。这一点历史曾给我们做过一个

独特而生动的“试验”，那就是魏晋以来，封建朝廷为了显示自己的高雅文明，曾极力美化公文，一律用镂金错采的骈文写作；当别篇文章已恢复散体，朝廷公文却仍是“骈四俪六”，一直到民国初年。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增强它的艺术性，反而更显得面目可憎，令人生厌。这个“试验”的失败，当然有多种原因，主要的就是对实用文章修饰过甚，反而削弱了它的实用价值，违背了上述规律。

二 文字上的特殊性

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汉字，有着鲜明的特点。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大致成方形的独立的形体，只有一个音节，具有特定的含义。古代散文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就与这方块字的特点大有关系。因为汉字笔划繁多，难认、难写、难刻，这就促使作者讲究用语的简洁精炼，以少胜多。因为汉字为单音节文字，且有四声的区别，这又促进对偶的运用和骈文的产生，使散文具有声音节奏之美。因为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形与义结合牢固，即使读音变了，仍可见形而知义。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散文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古至今，从南到北，不管方言多么复杂，不管古今音变化多么明显，只要认得汉字，没有不晓其义的。这就易于流传，便于揣摩，利于提高。不过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它逐渐与口语脱节，愈来愈脱离人民大众，使得古代散文的学习、创作与鉴赏限制在少数人中，最终不能被语体文挤出历史舞台。

三 内容上的复杂性

如果说我国古代的诗歌还有来自民间的民歌、民谣、曲子词，古代的戏剧、小说还包含着民间艺人的创造，多少体现了一点全民性的话，那么古代的散文却是清一色的文人作品。而且作者大都是封建王朝大大小小的官吏，纯布衣之士也是很少的。这就使得古代散文要比古代的诗歌、戏剧与小说更富政治色彩。且不说与政治直接关连的政论、奏疏等，就是只叙个人经历的传记、墓志、祭文等，也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关注。即使是记叙建筑、地理、农田水利的文章，也往往是出于对政治的关心而写作的。像宋代曾巩的《越州鉴湖图序》，谈的是水利，却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可以说，强烈的政治性是古代散文的一大特点，也是一种传统。这就决定了古代散文内容上的复杂性。当作家的立场、感情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愿望相契合时，就会写出刚健清新，甚至可歌可泣的文章来；当作者为封建统治者唱赞歌，向读者进行封建说教的时候，他们的文章必然是索然寡味，面目可憎的。所以在古代作品中，可以看到敢言直谏、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可以看到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勤劳与反抗；还可以看到祖国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雄伟的山川，等等。但无可否认，作家的陈腐的封建意识，消极的人生态度，甚至反动的官僚立场，也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且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同在，腐朽与神奇并存。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与借鉴过程中做一

番批判继承的工作。

四 理论上的稳定性

中外文学的一切品类都有它的继承性,然而像我国古代散文那么突出,却是不多见的。几部儒家的经典,可以成为万世不变的神圣典范,一种教材(如《文选》)可以用上千把年,一种题材(如秦灭六国)可以写上几百上千年。正应了鲁迅的一句话:“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华盖集·忽然想到》)为此历代都有人以复古为时尚,以拟古为最大的本领,以致作品的时代感不强。一篇作品如果不标明作者,往往不能一眼就看出是什么时代的作品,致使文体与内容变化缓慢,缺乏个人特色。我国古代伪书之多,而且不易辨识,也与此有关系。这种“千年一贯制”的保守的稳定性,决不是文体本身的过错,而是一种强有力的创作理论在作怪。那就是由儒家的文学功利观念所产生的“载道”理论,或称之为“经世”习气。这种理论把散文当作传载孔孟之道的工具,把散文写作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王安石就说过:“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上人书》)这种把写文章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联系起来的理论,表面上似乎是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却是降文学为政治的附庸。这种理论本是对文学的功用的片面理解,但对封建统治有利,历代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就将它捧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理论,乃至成了儒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它具有无可移易的权威性,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与约束力。

一有偏离,即视为离经叛道,就要进行围剿。像清初顾炎武说的:“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十九)顾炎武是封建社会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尚且持此强硬的观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散文家一直以发扬六经之旨,维系世道人心为创作的最高思想境界,很重视重大题材的写作,这就促成了古代散文主题的严肃性。古代散文中的政论、史论、战争论、人物传记等作品之所以特别多,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易于载道传旨。即使是记山川楼台、花草虫鱼,也总是要赋予某种人生真谛、天人奥妙等或隐或显的社会意义。对于一己之私,七情六欲,总不敢大胆表露,一旦涉嫌,仿佛就是对圣贤的亵渎。像唐代作家杜牧,在诗中可以写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样的诗句,而在他的散文中却全然又是一副严肃的政治家、军事家面孔。因此我国古代散文中纯粹的抒发情志心态的作品不多,尤其是表现自我的细致的心理描写更见稀少。因此偶有宣泄个人私欲和真情的文章,就显得特别珍贵。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以及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尽管蒙着忠孝仁爱的封建道德外衣,由于它们触及到了人类的最可宝贵的人伦之情,所以成为千古传诵之作。

这种稳定的理论,有它的功劳,也有它的过错。

许许多多记下国家的兴亡,录下历史的足音,歌颂民族的正气,挞伐民族的败类,以及描绘祖国河山的优秀散文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出来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良的文风也有赖于此一理论而得到纠正。但是这种理论有它的保守性,并由此而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这种理论无异于给散文筑起一道高墙,把自身禁锢起来,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到后来,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推倒这堵高墙的勇气,或者不对这种理论作灵活的为我所用的解释,那是很难写出有生气的作品来的。古代散文之所以逐渐退化、僵化,最终不能不退出历史舞台,与这一贯彻始终的严肃有馀,灵活不足的理论是很有关系的。

第二节 古代散文的文体分类

我国古代散文历史悠久,作品浩繁,“汗牛充栋”已不能形容它的数量之多,“五花八门”也不能形容它的名目之杂。因此,它的文体分类就显得特别重要,也显得特别困难。可以说,对古代散文文体作出恰当的分类,既是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的成果。自古以来,不断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分类达到了完善的无可挑剔的地步。下面就这个问题作点介绍。

一 古代的分类

我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分类,起源很早。可以说,有文章的结果,就存在文章的分类。随着作品的增

多,分类工作也就经常化、复杂化起来。纵观我国文体分类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又由博到约的过程。

魏晋以前是散文分类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没有人专门研究,只是从需要出发,对某些文体作了某种分辨,当然是简略的。被人们称为散文之祖的《尚书》就有明显的文体区别,它的典、谟、训、诰、誓、命就是六种朝廷公文的文体。《周礼》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词),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诰,六曰谏。”这也就是六种实用文体。东汉的蔡邕在他的《独断》一书中,更把帝王对臣下的训令分为四种:策书、诏书、制书、戒书;把臣下对帝王的上书也分为四种:章、奏、表、驳议。并且对每一种的写作规程都作了一些说明,如对“诏书”的解释: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

不过这些只是从朝廷典章制度的角度,对朝廷公文作了某些区分和说明,并非有意识的文体分类。

曹丕的《典论·论文》谈到不同文体的写作要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里提到的文体就已超出朝廷公文的范围,共八种,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散文。稍后的陆机在《文赋》中也论到文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

质，诤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他提到的文体有十种。不管是《典论·论文》也好，《文赋》也好，它们所涉及的文体分类，只是举例性质，当时的文体远远不止这些，所以仍不是全面的分类。

真正研究文体分类的是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东晋李充的《翰林论》，可惜都已失传，但从残文和前人的评论看，二书都对文章的体裁作了较为详尽的分类。究竟如何分类，因未见全书，不敢凭空武断，但它们作为文体分类进入自觉阶段的一种标志是无可置疑的。

至南北朝，文体分类来了一个大发展，仅在梁代就有三部涉及到文体分类的著作，即《文章缘起》、《文心雕龙》和《文选》。《文章缘起》相传为任昉所作，广泛地收集了秦汉以来各种文章的名称，并各溯其源，计列有八十五题之多。但释词过于简略，分体也嫌琐屑，不大为人所重。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巨著，全书五十篇，其中二十一篇就是论述文体的。这二十一篇的题目中就标出文体三十四种：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此外未列入标题（一级类目），而在正文中连类论及的二级类目还有不少。如《书记》一篇就兼及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

辞、谚等二十四种,《诏策》一篇也兼及命、诰、誓、令、制、戒、敕、教等。如此相生相关,云连波及,所论列到的文体,数目非常可观。而且对每种文体又都“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文体分类体系。

萧统的《文选》略晚于《文心雕龙》。萧统与刘勰不仅同时代,而且交谊很深,《文选》的文体分类不能不受《文心雕龙》的影响。《文选》共分三十七类: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从标目看,《文选》所选录的文体多于《文心雕龙》,但是从所论列到的文体总量上看,《文心雕龙》又远远超过《文选》。原因很明显,《文心雕龙》有一小半是文体论,当然力求详尽;而《文选》属文学总集,所分文体的多寡要受选文的限制。《文心雕龙》以所有文体为研究对象,而《文选》则只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作品,选录的文体自然要少些。

总之,《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体分类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它们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一些较为合理的分类原则,对当时的文体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类,保存了当时的文体面貌。《文心雕龙》还对每种文体的源流、特征和写作要求等作了精微详审的论述;《文选》则还保存了不少后来已经散佚的作品。但是它们也有缺点,像《文心雕龙》把“五经”奉为神圣,不把它们列为普通的文体,仿佛一列为普

通的文体，就是对它们的褻渎；对某些文体的区分也不尽恰当，对某些文体名称的解释，也有牵强附会的地方。《文选》则拘泥于从文章的题目来确立文体，把本为一体的分为数体，把本为数体的合为一体，显得有些琐碎，所以很多人批评它“分类碎杂”。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各种文学总集的编纂者在文体分类上，都以《文选》为准则。像北宋李昉的《文苑英华》、姚铉的《唐文粹》、南宋吕祖谦的《宋文鉴》、元代苏天爵的《元文类》，以及明代程敏政的《明文衡》，无一不仿《文选》体例。这样《文选》分类的优点和缺点，同时被继承了下来。只有南宋的真德秀想到要翻一下花样。他编了一部《文章正宗》，对文体分类来了一个大简化，只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门。其中的“议论”和“叙事”体现了散文的基本特征，很有概括性，一直沿用至今。只是他的分类过于简略，不切实用。

到了明代，又出现了两部专门研究文体的著作，那就是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它们对于文体的分类仍然恢复旧观，《文章辨体》分为五十九类，其中散文四十九类；《文体明辨》更作了大量的扩充，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其中散文一百零一类，类别之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此庞杂琐碎的分类实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以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刺它说：“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

到了清代，一切学术进入了一个总结性阶段，文体的分类也有了较为满意的成果。桐城派首领姚鼐

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首先将诗歌与散文分家，将散文单独编成总集；在分类上大大地加以简化，只分为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这样就做到了以简驭繁，改掉了分类碎杂的毛病。此后曾国藩又在《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编有《经史百家杂钞》，除了选文范围略有扩充外，更在分类上有所调整。它分十一类，分别隶属于三大门：1、著述门，包括论著、词赋、序跋三类；2、告语门，包括诏令、奏议、书牋、哀祭四类；3、记载门，包括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四类。如此分门系类，更为简明、显豁。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尽管还有缺点，但不能不承认它们的分类是繁简适当、方便实用的，是文体分类史上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与好评，从而使古代散文的分类趋于定型化。

二 现代的分类

上面说的是古代散文分类的历史情况，那是古人根据他们的文学观和当时的散文文体状况作出的选择，今天看起来，确乎有点主次不分，轻重失调，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它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散文作品之繁富，体式之多样，正好体现了作为杂文学的散文的特质。为此对古人的分类，就应该采取灵活的态度，不要一概肯定，也不要一概否定。如果偏重于整理、介绍古代的散文遗产，以给不熟悉情况的人提供资料，指示门径为目的，那么对古人的分类就应基本上保持原有面貌，不宜作较大的调整，如二